

我們需要這個思想文化空間

徐友漁

不知不覺地，《二十一世紀》迎來了自己二十歲生日。一想起這份刊物，心中油然而現的印象是：一個重要的思想文化陣地。「陣地」這個詞其實不錯，可進可退、可入可出，人們也熟悉，但太帶中國大陸鬥爭哲學意識形態的氣味，所以，還是把《二十一世紀》說成是思想文化的討論空間為好。筆者一直以為，《二十一世紀》的獨特價值就在於，當中國需要思想文化討論空間而知識界無法在別處建立這個空間的時候，它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現了，它給許多思考中國問題的學者提供了寶貴的場所，為二十年中國思想文化界的曲折行進留下了忠實的記錄。

確實，《二十一世紀》從剛一誕生起就顯示了鮮明的特色，它把各種關於中國的問題、現實和前途的分析、預測、感悟，以充分的空間和突出的地位表達出來。比如杜維明在〈化啟蒙心態〉中說：「面向二十一世紀，啟蒙心態的弊端有目共睹。我們除了要忍耐救亡的迫切感以平常心來進行啟蒙的補課，還得從根源處對現代西方文明作全面而深入的反思。」^①季羨林在〈東西方文化的轉折點〉中認為，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中西文化的優劣成敗、興衰更替，二十一世紀可能就是轉折點^②。對以上兩位先生的高論，筆者不敢苟同，但他們的言說具有代表性這一點則是毫無問題的。在關於中國的論斷中，筆者最為共鳴和服膺的是余英時的看法，他認為「二十一世紀中國所面臨的最大課題便是怎樣在二十世紀的廢墟上重建民間社會，使一個比較合理的新秩序得以逐漸實現」。他提出的口號是「待從頭，收拾舊山河」^③，悲憤和期盼都包含在裏面了。



可以說，自1990年代起，中國思想文化界的重大討論、爭論，都在《二十一世紀》上有所反映。其實遠不止此，一些重要的討論就是《二十一世紀》組織和發動的。從筆者關注的角度來說，以下的討論題材和影響都比較大，而且討論也比較深入、持久。第一，關於中國近代以來知識份子的心態或社會形態是以激進主義為特色還是以保守為特色；第二，關於民族主義在近代中國的形成、變遷、作用；第三，關於後現代主義在當下中國的作用；第四，鄧小平在南方視察講話發表後的中國局勢，尤其是對於

腐敗、社會不公正現象的揭露與分析；第五，如何認識當代中國國情，或所謂「洋涇浜學風」問題；第六，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方方面面。

對於或多或少了解中國當代思想文化流變的人來說，1980年代的中國及其「文化熱」是相當值得懷念和追憶的，人們似乎重新置身於「五四」場景中，將個人的奮鬥、熱情與國家命運相聯繫，理性與激情交相輝映，學術與思想相互促進。1980年代末的驚天事變把所有的探索、建設和積累掃蕩甚至粉碎，競技場上的健將和健兒要麼沉默蟄居，要麼飄零海外，整個神州大地「萬馬齊喑究可哀」。是《二十一世紀》，使得流離失所的思考者有了一間小小的居所，是《二十一世紀》，使1980年代的思想命脈延續、薪盡火傳。

《二十一世紀》對1980年代優良傳統的繼承，最突出的是對於中國現實的關注，對於中國命運前途的思考，並且把這種關注與思考以學理的形式表達出來。這個空間容納了1980年代活躍的主要思想文化派別，比如「中國文化書院」、「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等等，而且吸引和促使海外眾多學者參與對於中國問題的討論。這一空間一直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舞台，相當一段時間好戲連台，聚集了眾多名角，吸引了廣大熱心的觀眾。還值得指出的是，在這二十年的時間裏，《二十一世紀》還發現、扶植了不少年輕一代的作者，他們的文章猶如一陣清新的風，使得思考和討論更有生氣和色彩，更加多元。

在二十歲生日到來之際，《二十一世紀》似乎可以自問：歷史使命是否已經完成？二十年的成就與輝煌是否能夠繼續？

從悲觀方面講，不利因素大致有如下幾點：一、中國大陸本體的社會現實變化發展太快、太複雜，從海外理解和把握愈來愈困難，思想文化上引領潮流愈來愈難於做到，隔膜很容易出現；二、由於年齡、精力、興趣轉移等因素，寫作隊伍中不少大家、名家已經逐漸淡出；三、對中國大陸地區的發行渠道不暢通，影響下降。不過，有利因素也是顯而易見的，比如，現在世界上還找不到像《二十一世紀》這樣的學術思想平台，可以吸引、聚集全球的華語作者來發言。當然，至關重要的優勢還是，不論中國大陸思想文化界多麼活躍，多麼貼近生活與現實，有多麼長足的發展，香港（相對而言）的言論表達自由仍然具有決定性作用。

只要中國大陸尚未開放言路，《二十一世紀》就有特殊的存在理由，就有繼續發揮的空間，而這取決於《二十一世紀》編輯同仁以及新老作者的努力。

註釋

- ① 杜維明：〈化解啟蒙心態〉，《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0年12月號，頁13。
- ② 季羨林：〈東西方文化的轉折點〉，《二十一世紀》，1991年2月號，頁5。
- ③ 余英時：〈待從頭，收拾舊山河〉，《二十一世紀》，1990年12月號，頁6、7。

徐友漁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